

前言

日月变换，斗转星移。忙碌的人们是否清楚，是中华文明赋予了每个炎黄子孙以生命和智慧？曾否思考，在血脉中浸润和积淀了五千年之久的文明，具有何等价值？

中华传统思想源远流长，为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不竭的精神资源。介绍中华传统思想，离不开产生那些思想的历史环境；离不开阐发那些思想的先贤哲人；更离不开那些传统的经典著作，如儒家的四书五经、道家的《老子》、《庄子》，释家的经律论等等。“天人合一”是我们祖先的思维方式；“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共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处世的美德；“忠孝节义”是人存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是规范个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天地君亲师”的思想，反映出百姓敬天地、忠社稷、重家庭、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思想的精华所在，体现出了诚（实）、善（良）、和（为贵）、（包）容等优点。不论对中国传统思想做何评价，了解这个祖先留给我们的极其丰富多彩的遗产，一定能拉近读者与传统的距离，使读者人文素质的积淀更加深厚。

朝代更迭，沧海桑田。中华传统思想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中华传统思想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把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社会；“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孔子把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给世人；公元前后，“慈悲普度”的释家佛法东传。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形成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思想。自秦大一统后，汉民族不时被少数民族统治，包括南北朝、五代、元、清等等，然而统治者无不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历史上，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最开放的唐朝，恰是中华国力的鼎盛时期，科学技术也因此当时的世界上独领风骚。欧洲、中东、东亚等地都派人来长安学习，万国来朝，重译款塞。中华传统思想代代相传，不仅构成了中华文明之根，更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中华传统思想追求天人和諧，重视个人的修养。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向上延伸为臣民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家庭伦理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臣民的“仁”。家庭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就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分。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净土地狱、善恶有报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华传统思想的核心。道家修“真”，佛家主“善”，儒家讲“忠恕”、“仁义”，三者“外略形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无非欲人同归于善。”儒、释、道三大文化支柱给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中华传统社会赖以存在、安定与和谐的基础。这才是以“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最有价值之处。

本卷旨在将中华传统思想之精华，用简单轻松和平易近人的风格娓娓道来，希望能给读者提供一个了解祖国悠久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的专门天地，使读者对中华传统思想的内容和演进历史有一个初步的把握，并对中华传统思想在当代民族复兴事业中扮演何种角色，能够有所思考。

作者

2007年8月28日



总序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凝结着炎黄子孙改造世界的辉煌业绩,包含着华夏先哲的无穷智慧,是先民留给后人的一份极其丰赡、弥足珍贵的宝藏,是人类文化园地中一朵璀璨的奇葩。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传统文化就像一位永不疲倦的精神纤夫,牵引着历史航船破浪前行。

中国传统文化纷繁复杂。它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物质文化是指经过改造了的自然存在物;制度文化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规范化了的经济、政治、教育等各种制度、体制和方式;精神文化是指人类在加工自然、塑造自我的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风尚、宗教信仰、民族习性等等。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文化因子已经成了明日黄花,但有许多文化因子具有着超越时空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推进历史发展的“价值客体”。

中华民族历来有着尊重历史、珍视文化、继承发展、综合创新的优秀文化传统。尤其是在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大力开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丰富的宝藏。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人类历史上的那些优秀文化遗产就如一座座高峰,我们要定期登上这些山峰去看一看,去呼吸新鲜空气去汲取营养,然后我们才能神清气爽地下得山来,勇敢地投入生活。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汲来中国传统文化这渠活水,它可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保证。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学习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能给勇敢者以智慧,也能给勤奋者以收获”;“它能给懦弱者以坚强,也能给善良者以欢乐”……

中国传统文化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随着历史的高歌猛进,中国传统文化所使用的语言,当时虽然明白易晓,今天却变得古奥难懂了;所反映的生活,当时虽然真切实在,今天却显得遥远隔膜了;所表达的观念,当时虽然几乎妇孺皆知,今天却已经逐渐被人淡忘了。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我们吉林人民出版社组织编写了这套《图说中国文化》丛书。全书共分十卷:思想卷、文学卷、艺术卷、科技卷、考古发现卷、建筑工程卷、中医中药卷、器物卷、饮食卷、民俗卷。每卷均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或对文化巨人、文化思想,或对文化事象、文化运动,予以阐释。但要凿通悠悠的时空隧道,破解往圣先贤们的符号编码,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而且尚有许多见仁见智、悬案百年的问题。因此,我们的叙述和阐释只是读者达到彼岸的桥梁,而它们本身并不是彼岸。

面对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这套小丛书只能说是在海边采撷了几个小小的贝壳,远谈不上包罗净尽、解说确当,更不待说尽其精要、毕发奥旨了。为此,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教,以期日后改正提高。

胡维第

2007年8月28日





前言

001. 中华民族的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	011
002. “周易”与《洪范》	014
003. 周公的“敬天保民”思想	018
004. 管子的用人思想	021
005. 孔子：儒家学说的创始人	023
006. 孟子的性善论	028
007. 荀子的自然观	031
008. 老子的辩证法思想	034
009. 庄子的自然主义社会观	037
010. 墨家思想	040
011. 战国时代的对外交往	043
012. 韩非的法治思想	047
013. 孙子的军事思想	050
014. 秦始皇的大一统思想	053
015. 贾谊《过秦论》中的政治思想	056



目录

思想卷





目录

思想卷



016. 黄老政治中的“无为”思想	059
017. 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062
018.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	065
019. 汉初的“重农抑商”思想	068
020. 桑弘羊的经济理论	070
021. 汉代讖纬思想	072
022. 王充的“天道自然”观	075
023. 玄学的名教自然之辩	077
024.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思想	080
025. 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	083
026. 范缜的无神论思想	087
027. 《颜氏家训》的家庭教育思想	090
028. 《文心雕龙》的文学批评思想	093
029. 张斐的法律思想	097
030. 贾思勰的平民治生思想	100
031. 初唐的居安思危思想	103

目录

思想卷



032.唐太宗的“任人唯贤”思想	107
033.初唐的科举取士	110
034.李靖的军事思想	114
035.禅宗的“顿悟成佛”论	117
036.韩愈的儒家思想	120
037.唐诗中的宗教思想	124
038.僧皎然的诗歌创作思想	128
039.张彦远的绘画评论思想	131
040.张怀瓘的书法创作思想	134
041.王安石的“改易更革”论	137
042.《救荒活民书》中的社会救扶思想	140
043.司马光的“尊君御臣”思想	143
044.周敦颐与《太极图说》	146
045.张载的“太虚即气”说	149
046.二程的“天理”思想	152
047.朱熹：理学的集大成者	155



目录

思想卷



048.陆九渊的“心即理”思想	160
049.宋代的史学思想	163
050.《大明律》中的封建法律思想	167
051.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	171
052.李贽的“童心”说	176
053.戚继光的练兵思想	179
054.丘浚的商业思想	183
055.徐光启的“兴农救国”思想	186
056.黄宗羲的政治思想	189
057.顾炎武的“明道救世”思想	193
058.王夫之的哲学思想	196
059.清初形成的“工商皆本”思想	200
060.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203
061.魏源的“开眼看世界”思想	206



032 唐太宗的 “任人唯贤”思想



唐太宗的人才思想内容中，任人唯贤的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贞观统治集团认为，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官僚队伍，提高官僚队伍的素质，是使天下致治的重要条件。“致安之本，唯在得人”。贞观三年（629），唐太宗让大臣封德彝举荐人才，封德彝说：“未见有奇才异能。”唐太宗听了以后很不满意，说：历代明智的君王用人，都取士于当代，不借才于异代。哪朝哪代没有贤人？只是贤人被遗忘而未被发现而已。唐太宗认为任何时代都有贤人，统治者应该主动祈求贤才。

唐太宗选拔人才的原则：

一是不避亲疏，唯才是举。贞观七年（633）唐太宗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长孙固辞不受，说我是外戚，恐怕天下之人认为陛下为私。唐太宗说：“吾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仇不弃，魏征等是也。今日所举非私亲也”。襄邑王李神符是唐太宗的堂兄弟，为人没有威信，身体又不好。唐太宗不重用他，只好回家赋闲。魏征在隋末天下大乱时，参加过农民起义军，后任太子李建成的太子洗马，曾劝说李建成尽早除掉秦王李世民。李建成被杀后，李世民召见魏征，责问他为什么离间他们兄弟，魏征说如果李建成当初听我的建议，就不会有如今的下场，李世民器重魏征的正直与才干，抛弃曾为仇敌的宿怨，任命魏征为詹事主簿，并不断加以重用。魏征也以遇到知己爱才之主，竭尽智能谏诤，使唐太宗减少了许多错误。

二是量才授官。求得人才固然重要，但如何使用人才更为重用。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致治之本，唯在于审。”所谓审，就是根据各人品德的厚薄、才能的高下，分别委以相应的职事。魏征说得更为明确，即“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使之各当其所任。

三是用人务求精而不求多。贞观元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唐太宗认为，任用人才，不仅唯贤而且不必多，贤中选贤。任用官员“不必备，唯其人”，即要求任官不求全，而唯在得人。在选官用人问题上唐太宗认为任官不得其才，就像画地作饼，只能看不能吃；千羊之皮，不如一狐狸腋下的毛皮珍贵。应当精简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理矣。”宰相房玄龄根据唐太宗这种“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用人思想，将中央文武官员减至六百四十三人，创造了中国历史



山西太原晋祠贞观君臣群雕



唐太宗像

上罕见的简政的光辉范例。

用人择官，对于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以人治为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往往是其人在，其政存；其人亡，其政息。因此用人问题就更为突出。唐太宗为首的贞观统治集团注重求贤、用贤，审于择官、重于任能，这就使得社会秩序的安定、国家致治的实现，具备了最基本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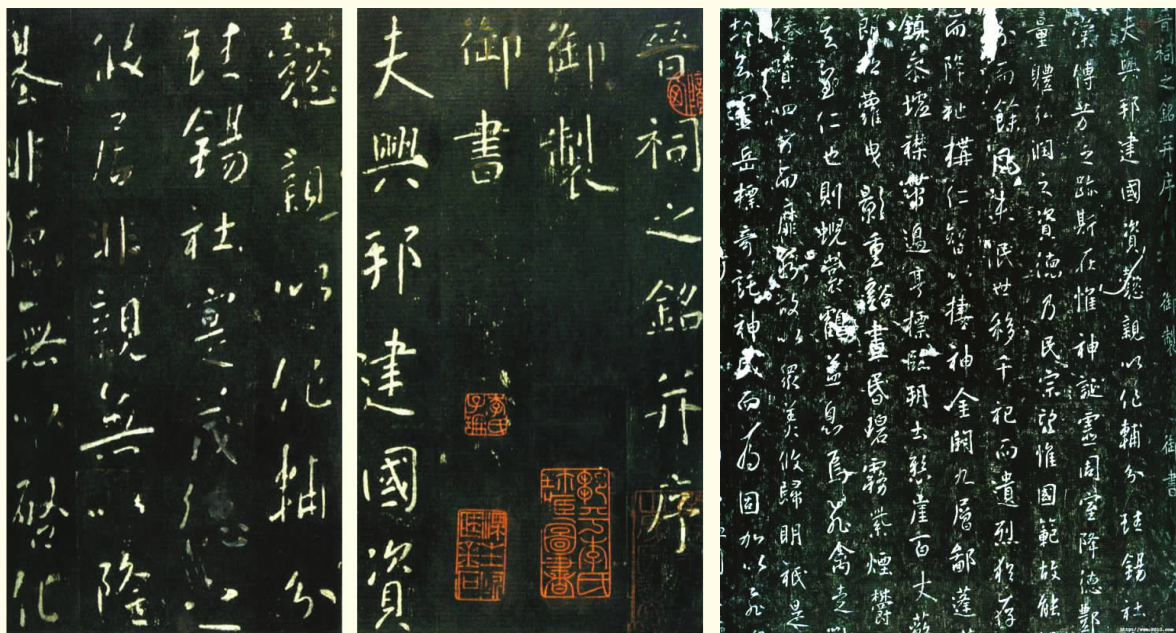
在唐太宗的用人思想中，非常注重择人要慎重不可仓促草率。他说：“用得善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由于这一原因，“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出于维护统治秩序的心理，以唐太宗为首的贞观君臣把人的品行看得比人的才能更为重要，在品行端正的前提下，再考察人的能力，力求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对此，魏征解释得十分清楚：“但乱世唯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关于才能，唐太宗等贞观君臣认为，才能的主要参照标尺，是人的学识，“今所任用，必须以学识为本。”学识就是人的文化素质，其主要

唐昭陵远眺

唐昭陵为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寝，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北的九峻山上。自贞观十年（636）埋藏长孙皇后时开始营造，至贞观二十三年（649）葬李世民时止，历时十三年。昭陵首开唐代“以山为陵”的先例，是初唐走向盛唐的实物见证。石刻艺术是昭陵的重要组成部分。碑石占陵园石刻的绝大部分，其中部分碑文出自唐代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之手。





晋祠铭 [唐] 李世民

晋祠位于太原市西南郊，创建年代现已无从稽考，不过，根据有关记载可知，晋祠早在北魏之前已经有了。发迹于太原的李世民称帝后，于贞观二十年（646）重游晋祠，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写就碑文。全文共一千二百余字。此碑的价值并不在于其赞颂先人追记伟业的内容，而在于其杰出的书法艺术。李世民一生酷爱书法，尤其崇拜王羲之，深得其行书真髓。这篇《晋祠铭》被认为是仅次于《兰亭集序》的行书杰作，其中三十八个“之”字各有千秋，绝无雷同，可谓国宝珍品。

内容是“知前言往行”，也就是要熟知历史经验，并且能够从中获得政治统治的经验和方法。“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当然这里所说的学识，主要是指要选择那些精通儒家经典的人做官。虽然儒家经典在政治实践中未必是万能的灵丹妙药，然而以儒家经典作为标准，可以提高官僚们的文化素质，阻止不学无术的庸人进入仕途。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政治开明与否，几乎都与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密切相关，唐太宗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不愧为一代名君。

唐太宗非常重视地方官吏的任用。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对待臣说：“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唯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地方长官的贤否，与民众的苦乐攸关。而民众的苦乐，又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所以唐太宗在屏风中录下各地方长官的姓名，用

以记录地方官的政绩，这对于地方官吏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昭陵六骏“青骊”

青骊，苍白杂色，为李世民平定窦建德时所乘。窦建德自称夏国王。唐军扼守虎牢关，占据有利地形，李世民下令全面反攻，亲率劲骑，突入敌阵，一举擒获窦建德。石刻中的青骊作奔驰状，马身中了五箭，均在冲锋时被迎面射中，但多射在马身背部，由此可见骏马飞奔的速度之快。



中国的科举制首创于隋朝。当时隋朝选拔的官吏主要是北周的旧士族，南朝的江南士族和北齐的山东士族，只能保持社会声望，却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殊权利。于是朝廷采取考试法，这就逐渐形成成为科举制度，使士族有入仕当官的途径。说到考试两字之原始意义，考是指考绩，



开封清明上河园古代科举的大门

科举

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

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6）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唐代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宋朝则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建立了防止徇私的制度；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越来越多，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试是指试用。在战国时代，就有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提倡选“贤与能”，提倡考课与铨叙，其用意在于规定政府的用人客观标准。汉代的选举制度就是由此提倡而形成的。这种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为乡举里选，当时各地方时时可以选举人才到中央。他们的选举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由皇帝下诏给地方政府，希望推举贤人来向中央政府献良策，或替国家做事。这种选举是无定期的。这样选举来的人，一般称为贤良。再有一种是定期的选举，称为举孝廉。汉代的地方长官不仅管理行政，还有责任替国家物色人才，将本地的孝子廉吏向中央推举，每年一次。汉武帝以后形成固定制度，那时是满二十万户的地方政府得选举一个孝廉。孝廉逐渐成为一种参政资格的名称，原来的孝子廉吏的含义也逐渐失去了。孝廉由地方选举之后，中央再加上一番考试。这一制度，包括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等四项内容，得以最终形成。这样，进入中央办的太学学习，毕业后到地方做官吏，再由地方政府举孝廉到中央，又须经过中央规定的一番考试，然后才正式入仕途。这是当时入仕从政的唯一正途。政府的官吏，几乎全是由此途径出身。从此以后，孝行、清廉、知识，成为中国封建政府的用人标准。

汉朝的选举制度，到东汉末年，由于天下大乱、中央权力式微，一切制度完全紊乱，乡举里选的制度也无从推行。曹魏政权建立后，制定九品中正制，本着一从众、一从贤的原则，依据各地方群众的舆论与公共意见，把人才分为九等，

中央政府吏部再根据此种评品之等级来斟酌任用，分别黜陟。这原本为中央任官制定了一个客观标准，但后来却演变成了拥护门第、把推举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的局面，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大族的弊端。隋代针对此种弊端，改成自由竞选，即不需要地方长官推举，也不需地方群众的公共意见，把知识分子的入仕之门完全打开，径由各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考试，中央根据考试成绩来选拔录用，这就是科举制度。

从隋文帝开始的科举制，中经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等不断修订、完善，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已经成熟。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等，其中明经、进士两科尤为重要，名臣多以这两科出身。明经主要考儒家经文，进士主要考诗赋。考试及格称为及第。唐朝开元二十七年(739)，官修的《唐六典》里明确记载了有关科

举取士的完整规定。

科举制使得不同阶层的人，主要是贵族官僚和地主富豪家的子弟通过朝廷的公开考试，以定优劣，优者入仕为官，劣者名落孙山。这种以考试定优劣的竞争机制，打破了魏晋以来以出身门第定优劣、门阀士族垄断政治权利的局面，同时将选拔人才的办法，从人为的随意性向制度的规范化转变，有利于人才发愤图强、认真读书，培养和选拔了大批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人才。在《唐摭言》中就曾描述唐太宗看到新及第的进士缀行而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统治者利用科举将天下英才统统控制于手中的用心。《唐摭言》在总结科举制度时说：唐太宗“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从制度上保证其任人唯贤的思想，又使天下英雄都纳入

到统治秩序之中，从而保证唐朝封建统治的稳定。也有人说：唐太宗用科举选拔人才真是个好办法，使得天下的英雄为此都白了头发。



西安大雁塔 唐代进士及第后，要题名大雁塔。因此考中进士被称为“雁塔题名”。

因南北朝以来诗赋对文人有吸引力，而诗赋比起经文，在思想上比较自由，能表现出文人的才能，所以文人大多应考进士科，因此唐朝的进士科特盛，很多名人多从进士科出身。而及第人数，一般是进士百人中取一至二名，明经科十人中取一至二名，难易悬殊。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意思是说，三十岁考中明经科的人就算很老了，而五十岁能进士及第的人还算少年。因此，当时朝野上下都重进士、轻明经。

有人为了能进士及第，甚至自言“老死于科举也毫无怨言”。

其实科举制并非像统治者宣扬的那样，是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竞争机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有不少弊病。如主持科举的官员不能秉公办事，或屈从、巴结权贵，或因个人恩怨有意压制考生，或为保住自己的权势不录取天下贤俊，或接受贿赂、请托、人情而徇私舞弊，致使有些无才无德、甚至不学无术之辈也轻而易举地名列

江南贡院

贡院是我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场所。南京的贡院初时只供府县学考试之用。明代定都南京，苏皖两省乡试及全国性的会试曾在此举行。迁都北京以后，南京为留都，仍按期举行考试。清初，今江苏安徽两省称江南省，故贡院一直沿用“江南贡院”之名。大门前有广场，主牌坊正中匾额书有“贡院”二字。“明远楼”可观贡院全貌，考官于楼上监察考场，楼四周为考生应试号舍，共计两万零六百四十四间。江南贡院规模之大，占地之广，与顺天（北京）贡院并称“南闱”、“北闱”，为全国考场之冠。





北京国子监 元明清三朝的最高学府

皇榜；大批无势无钱又没有背景，但却才华出众刻苦读书的文人却榜上无名。

科举是读书人入仕的阶梯，能够决定其一生的命运，致使大批读书人一生在科场苦度春秋，有些人年逾古稀始得登第，一辈子也无缘及第入仕的大有人在。晚唐诗人刘得仁自唐文宗开成年间至唐宣宗大中年间（836—859），出入科举考场二十余年竟毫无结果，赋诗叹道：“外家虽是帝，当路且无亲”，意思是说：朝中没有亲友帮助，就

是与天子沾亲带故，也始终是一介布衣。他的遭遇是无数读书人共同命运的真实写照。

此外，那些读书人经过千辛万苦考取明经、进士及第，也只不过是获得入仕的资格，还需要通过吏部考核身（体貌端正）、言（言辞辩正）、书（书法遁美）、判（文理优长），四方面都合格者才可授予官职。这种将科举制与吏部选连在一起的体制，又为人才选拔增添了许多人为的主观因素与弊病，妨碍了人才的合理使用。



从南北朝到隋唐期间，治乱、分合，凋敝、昌盛，战争频仍，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军事家和具有文韬武略的战将，李靖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军事理论家和名将。

李靖（571—649），字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人。出身官宦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不仅博学经史，而且精通兵法。其舅隋朝名将韩擒虎对他十分看重，每与论兵辄叹曰：“可与语孙吴者，非斯人尚谁哉？”李靖归唐时已年近百，十五年中四次统军作战，均获全胜。李靖的军事指挥艺术非常高超。他创造了“七军六花阵”并创造性地把“锥形之阵”用作战斗队形。他首创了纵队战术理论。其阵法：弩手、弓手与前锋队相间引进，再驻队两边相翊。纵队比线形式战斗队形具

李靖像



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使用各种办法调动兵力。他首创了逐次抵抗、交互掩护的撤退方法。后人评论李靖用兵，“临机果，料敌明”。李靖著有多种兵书，遗憾的是这些兵书大多散佚失传了，现在能看到的仅有他与李世民多次谈兵的言论辑录《李卫公问对》，也称《唐李问对》。

现存《李卫公问对》共三卷，五十四次问对，内容丰富，多联系唐以前战例及唐太宗、李靖本人的亲身经历，参照历代兵家言论，围绕着夺取主动权、“奇正”、“虚实”、“主客”、“攻守”、“形势”等问题进行讨论，阐述其军事思想，“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言，时有所得”。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李靖的军事思想。

一、奇正相生，变化无穷

奇正是《问对》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奇”与“正”不仅指兵力的配备，更指战术变化的原则。奇正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对重要范畴。《老子》提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孙子》提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以后的历代兵家都对奇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解释。《问对》的贡献：其一，进一步充实了奇正的内容。认为奇正包含有丰富的内涵，对敌人进行政治攻势是“正”，进行军事打击是“奇”；公开出兵是“正”，奇袭是“奇”；主攻方向或主要防御方向是“正”，协攻方向或次要防御方向是“奇”；前进是“正”，后退是“奇”等。其二，提出了“正亦胜，奇亦胜”的观点。《问对》认为善于用兵的人，无处

不是正，无处不是奇。“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从而发展了孙武的奇正思想。其三，提出了“奇正相变”的观点。《问对》认为，如果把奇正看成是相互分裂的两个方面，“奇正素分”，“以奇为奇，以正为正”，这是十分错误的，是不懂“奇正相变，循环无穷”的道理。因此《问对》说：“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其四，把“示形”同奇正联系起来，“示形”即给敌人以假象而将真实意图和行动隐藏起来的一种艺术。《问对》认为所谓“示形”就是用奇兵迷惑敌人，而不是用正兵，“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通过“示形”，把奇兵变为正兵，把正兵变为奇兵，变化莫测，使敌人无法了解真实情况。其五，把奇正同虚实联系起来。“避实击虚”是《孙子》中的一个重要思想，《问对》也极重视虚实问题。李靖指出：“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利焉。”《问对》将奇正同虚实有机地结合起来，“奇正者，所以致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其六，把奇正同散合联系起来。认为在兵力使用上，既不能过分分散，也不可绝对集中，而应做到“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

二、“变易主客”思想

“主客”就是指防御一方和进攻一方、防御之军和进攻之军。《问对》中说：“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认为进攻是防御的转机，防御是进攻的手段，两者都是为了争取胜利，不可分割。《问对》指出：“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为二事，若我懂得，则敌事败；敌懂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彼我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

对于进攻的问题，《问对》指出：“夫攻者，



唐代玉带版

不只攻其域、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只守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以有待焉。”这里的攻心战术，就是打破敌人的企图，摧毁敌人的意志的方法。而防御也不单纯是保守城池阵地，而应当把鼓励军队士气放到首位，待敌之隙而攻之。

对于防御问题，《问对》肯定了春秋时代越国大夫范蠡的观点：“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就是说，后发制人是用潜力，先发制人是用锐气。最大限度地挫败敌方锐气，最高程度地发挥我方潜力，才能夺取胜利。这是兵家运用潜力和锐气的奥妙。后发制人



咸阳三原李靖故居

建于唐贞观年间，位于三原县城北，是唐代卫国公李靖的故居，当时称为李氏园，又称唐园，俗称“东里花园”。后因战火成为一片废墟。清代李靖后人出资对此园进行重修。园内多为宋及明清建筑，是驰名陕西的古典园林。